

元 亨 文 存

中国儿童文学

天赋身份的背离



◎ 谭元亨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元 亨 文 存

中国儿童文学

天赋身份的背离

◎ 谭元亨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广 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谭元亨著. —广州：广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1

(“元亨文存”丛书)

ISBN 978 - 7 - 5361 - 5745 - 3

I. ①中… II. ①谭… III. ①儿童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①I20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8968 号

Zhongguo Ertong Wenxue: Tianfu Shenfen De Beili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编：510500 电话：(020) 87554152

<http://www.gdgjs.com.cn>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90 毫米×1 240 毫米 32 开本 13.125 印张 410 千字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定价：33.00 元

《元亨文存》编选说明

“大双栖，小双栖，游刃有余。”这是一位著名理论家对谭元亨的评价。“大双栖”指的是高校中的教学与研究，谭元亨自在高校任教以来，开设的文史哲及教育，乃至建筑方面的课程有20多种，深受学生（包括硕士、博士生）的欢迎。研究上更承担有国家、省部级以上10项课题。而“小双栖”，则是理论与创作，后者人所共知，出版有文学、影视作品数百种，获国家级政府奖多项，已编有选集、文集等，汇集了长篇小说、纪实文学20多部。理论类，则收在《元亨文存》。

《元亨文存》暂拟分10类。现已出版的一为历史哲学，即《中国文化史观》等；二为历史—美学批评，有《呼唤史识》等；三为中西思维方式比较，即《断裂与重构》及相关论文；四为广府族群研究，以《广府寻根》为代表；五为客家族群研究，选取《客家圣典》全书，以及《客家文化史》等的精粹部分；六为建筑理论，选取《城市晨韵》一书及多部相关专著精粹部分；七为文学类的，以《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为代表。

正在编选的还有人类学类的《华南两大族群的文化人类学建构》、中外贸易史类的《国门十三行：从开放到限关的逆转》，以及海洋文化类的《南海海洋文化论》等。初拟为十大类十卷。考虑到谭元亨已出版理论专著有40种之多，论文300余篇，日后待编的将有教育、美学、人道主义、珠江文化等不同类的选本。

代序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蓦然回首”

——巴黎“中国儿童文学日”演讲稿

我从会议的组织者让·佩洛院长处得知，为了这个“中国儿童文学日”，与会的学者们均精心地准备了自己的讲稿，这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份厚爱，我谨代表到会的中国学者、教授及出版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据我所知，你们将给我们讲的，都是当今世界进入科学技术时代、数字化时代后关于儿童文学的焦虑，关于网络与传媒，关于暴力——精神与物质的，关于性等，传统、优雅、质朴天真、纯净的儿童文学受到了种种挑战。事实上，这些在中国也是早已感受到了，某些方面甚至还会强烈一些——因为，你们或许是渐渐感受到的，而我们则是骤然之间，在短短几年、几十年间感受到的。我们正处于剧变之中，对某些变化往往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有些猝不及防。当然，这个“防”字说得未必妥当。但是，铺天盖地的网络，无时无刻不在的点击，似乎已钝化了他的想象，削减了他的乐趣。记得若干年前我在北美讲学时，一位坚持用笔写作的学者曾这么对我说：现在，什么都在“点击”，看电视、开大门、用电脑，再这么发展下去，人类生活便统统化了枯燥的数字点击了，包括写字的乐趣，都统统被这种简单的动作剥夺了，那人生还能有什么意义？

是的，一切都被数字化逻辑所取代，那么，人类的想象力还会那么天马行空，无遮无碍么？当儿童从一开始便依赖电脑上的鼠标之际，尤其是养成一种惰性，那种狂野的、无拘无束的、新奇的想象还可能产生么？是否他们从一出生便要格式化、数

字化？

想象力的衰退，不仅仅是自由的丧失，而且是人类的老化。人只有到了老年，才不依靠想象，而只依靠回忆与经验生活，但这时，记忆力也同样衰退了。失去想象力，再加上失去记忆力，那么，人生也就走到了尽头。痴呆症也许只是一种病态，但想象力与记忆力的丧失，将使人类的生存空间狭窄到什么程度？这岂不比病态更可怕么？

但未来世界绝不可变为铁灰色的、冷冰冰的物质世界，更不可变成一堆堆枯燥、干巴巴的数字，换句话说，数字的专制绝不可重复已有的权力专制与金钱专制。凡是专制，便是野蛮，人类早已用“反乌托邦”的警觉来告诫未来。

可我们能用什么来抗拒这种新的野蛮与蒙昧呢？

抗拒老化，便需要年轻化、儿童化。而年轻化、儿童化的象征，则是无穷的想象力、飞扬的诗意、极强的悟性、艺术——生命的游戏！

事实上，我们也已看到人类社会业已产生的这种普遍的抗拒——思维科学家们提出了21世纪当是“悟性思维”大行其道，与逻辑、理性分道扬镳；历史学家更认为“生态史观”已在人类的历史构想中日趋占据主导地位，“科技史观”则日趋衰落，最终丧失自己的领地；自然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们早已纷纷对这新一轮的“异化”发出了有力的抗诉……人类的生命力不在别的，不在细胞的分裂，不在基因的遗传，而在于无穷扩张的想象力——没有想象力，我们就没有了一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抗御新一轮的“异化”中，儿童文学才显得这么强大，这么大有可为——因为它具备当今抗御的一切必要的因素：想象力、生命的游戏、生存的诗意、极强的悟性、未曾被格式化和数字化的童心之梦幻！

中国儿童文学正在行动！

我们没有落伍，而且从来就不曾落伍过，有时，还会远远走在前面！

作为这次“中国儿童文学日”的主题演讲，我之所以来这么个开场白，是想说明这个讲演为何会立足于传统——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传统”这个字眼，已经给贬损得够多的了。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几乎已不屑一顾了，对传统已经产生了太多的偏见，似乎时尚便是一切。在儿童文学界也是如此，给谁加上一个“传统”的字眼，便是盖棺论定，说明谁应从历史与现实的舞台上消失掉了。而我本人，也已屡屡被时尚的先锋们冠以“传统派”的名号，无非是想证明我的“过时”，并应当退出了。而我偏偏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不甘心“退出”——事实也退出不了，因为总被他们提及，不得不加以回应。这当然是无可奈何的——好在这不是我搞的“商业操作”，而是他们搞的，而且已让他们搞得炉火纯青了。我只是不知道，当儿童文学也陷于这种商业操作之中，究竟还能剩下多少真诚的东西？

啰唆这么几句已显太多，还是回到我的主题上吧。

一、背离与回归

很感谢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IRSCL），给了中国的作家、学者很多的机会扩大自己的视野，使大家能在全球这个宏观的大格局中重新认识自身和中国的儿童文学。记得八年前，我也曾在巴黎做过一个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长篇演讲，那时讲的主题是“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会议反响之热烈，一直使我很感动。今天的讲演，当是上次的延伸。

是的，今天一开始，我便开宗明义，要讲的便是传统，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

那么，中国的传统是什么？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又是什么？

一提到中国的传统，每每首先讲到的便是儒家的学说，是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等。这对，也不对。过去关于儒家的负面讲得很多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儒家的学说作为一种教育伦理、一种

道德操守，它积极的一面便会更大地体现出来，中庸之道也就不会被视作虚伪与滑头了。把儒学简单化、符号化，是后人作茧自缚罢了。这里，不想过多地谈儒学的是是非非，这些自有大学问家来谈。我只是想说明，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是主流，可它并不等于全部。中国传统本身就很丰富，是多元的，不曾定于一尊。

因此，相对脱离儒家文化的束缚，亦不等于脱离传统，如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又如盛唐的众多奇绝瑰丽的名诗……其实，孔子前后，如老子、墨子、庄子等，也不可归入儒家文化之列，而他们在文学、在民间方面的2000多年的影响，恐怕也不在孔子之下。春秋战国，是中国传统的一个五彩纷呈的历史舞台，你不可说哪一位或哪个流派是传统，而别的就不能算。所以，轻言“脱离传统”是不足取的。

“影响了大半部中国文学史”（郭沫若语）的庄子的那些汪洋恣肆的散文名篇，你能说不是传统么？老子，魏晋时代的三曹、竹林七子，唐代的李白、李贺，一直到被视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位大诗人的黄遵宪，他们不也都被称为了传统么？如果不承认，那我们不仅想象力萎缩，似乎记忆力也出了问题。

文学如此，儿童文学更是如此。

正如我在八年前巴黎的讲演中所说的，中国儿童文学在产生、成长的过程之中，业已形成了自身的传统，这便是对“天赋身份”的背离，要挣脱那个“先天”带来的“孝子”的身份，争得自己的自由与独立。这一争取过程，贯穿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全过程之中，至今仍没有结束。

那么，这种“背离”，也就是中国儿童文学自身的传统。

如果说，我们要回归传统，回归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那便是坚持这种“背离”——孙猴子的沸反盈天、哪吒的“二次出世”、花妖狐魅们对“笑莫露齿，话莫高声”的反叛……而决非“郭巨埋儿”之类。

问题在于，你承不承认这才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真正传统——

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之一。揭示这一传统，正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这似乎已说得太神圣了点。

我们绝不可能把诸如《二十四孝图》之类的纯粹说教并实施思想钳制的东西当成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这一条，恐怕在全世界都是一致的。中国儿童文学的“背离”，之所以成为传统，正是对这种钳制的本能反抗——相对于世界儿童文学而言，我们恰巧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走向。这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传统区别于诸如北美、欧洲、拉美及非洲的地方。而今天，对中国儿童文学而言，强化这种“背离”，正是对传统有力的回归。

由于历史与语言的原因，世界对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儿童文学，了解得太少。有人试图以“发展中国家”这一尺度来衡量中国的文学及儿童文学，这显然是一种错位，是简单地把物质生活水平同精神生活画上等号。

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的东方古国而言，它的文学早已经不是“发展中”了，而是有过众多的巅峰、无数的辉煌，如唐诗宋词等，迄今是世界文学无法企及的顶峰。中国文学很早便属于“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中国作家绝不应在物质的强势面前显露出一种媚俗，让人以为你在精神上还处于弱势——中国的精神从来就没处于贫瘠的状态之中。

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上也决非处于弱势。缺少的，只是发现。

只有摒弃了“西方中心观”，才可能发现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发现中国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的绚丽多彩。尤其是中国的文学理论、审美观点，均是璀璨夺目、取之不竭的宝藏。儿童文学理论也是一样。任何“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都是极为幼稚可笑的，是孤陋寡闻所造成的。今天上午，由贵市图书馆展示的中国儿童图书及“十兄弟”的中国故事会，我想，正是在这种“互相发现”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创举。

当然，我们也不应再有过去“天朝独尊”的东方中心观。我们不敢说所有人已摒弃了这一观念，但至少比西方做得要好，我

们评介的外国作品远比外国评介我们的多得多——这在事实上已经有了很多证明。

二、固守与开放

非此即彼，非对即错，非是即非……过去，我们太简单地用二元对立来充斥我们的思维，文化上也是如此。

但事物并不做如此简单划一的呈示。例如，人们总是把开放对立于禁锢，说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与禁锢相近的，诸如固守、保守之类，也就统统被加以否定。可是，经历了若干年的开放之后，我们却发现并没有那么简单。

换句话说，没有必要的坚守，也就同样谈不上开放。失去了自我，开放又从何谈起呢？昔日，在北美看到的某些印第安人的“保留地”，看到殖民者的后裔为赎回前辈的罪孽，拼命给“保留地”以所谓的“优厚补偿”，我看到的却是醉醺醺到不知东方既白并因此早夭的又一代受害者。我在《海外中国孩子》三部曲之一的《黄孩子、红孩子、黑孩子与白孩子》中，就写到了他们这种生存状况。对于他们来说，坚守或固守业已不再，随之而来的所谓“开放”，不仅在文化上，甚至在肉体上，也消亡了自身——这还能叫“开放”么？

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失去了自信，认为自己没一点好的、可取的内容的话，盲目地接受对方不分好坏的东西，其后果则可想而知。中华民族历数千年而不衰，不似其他三大文明最终归于消亡，总归有自己存在与发展的理由，更何况它在历史上不乏辉煌与全盛的巅峰。那又有什么理由自暴自弃呢？

这次来到法国，发现学者们均在组织各种研讨会，研讨的内容是：当开放边界、统一货币之后，如何做到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否法国人的浪漫洒脱、德国人的严谨认真等优秀的品性也会给“统一”掉？我觉得这种讨论颇有意义，我们也在开放中有着同样的疑惑。自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开放与统一，决不等

于取消个性，否则，那将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大踏步的后退了。

我不仅是位儿童文学家，也是一位文化学者，这次带来的《客家魂》三部曲，正是从文化角度上揭示中国教育兴国的艰难历史进程。客家民系是一个很独特的民系，全中国仅有这么一个不以地方命名的民系，而它却遍布中国十几个省。客家民系之所以连你们外国学者也知道，在世界上颇负名气，是因为它出了众多的历史人物，从政治家、军事家到科学家、文学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如雷贯耳。这是一个很传统甚至说很保守的民系，否则，就不会说他们是中国古汉族的活化石。无论是其方言，还是其习俗，尤其是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都说明他们上千年以来，始终在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文化边界——如不这样，在千年迁徙、万里长旋之中，他们早就无形地消失在当地的文化及族群之中了。然而，他们又是开放的，他们相当积极地吸收着先进文化，重新锻造自己，这才会在近现代史上奋然崛起，成为这部历史上的亮色。

无疑，没有自身文化边界的固守，他们也就失去了开放的势态，正因为有这种固守他们才会开放得如此阔大与豪爽。开放，不仅仅是汲取他人的长处，同样也在显示自己的长处，并以自身的长处影响这个世界。

因此，固守与开放，应是一种互补，而不存在什么不共戴天的对立。

在儿童文学上，我们难道不应当采取同样的态度么？

中国儿童文学，理所当然是要固守，“背离”的传统，固守孙悟空、哪吒的锐气，固守《蒲松龄童话》（近来，我正在组织以童话的形式及语言写《聊斋志异》中近200个有儿童情趣的短篇）烂漫、多姿的文学传统，也只有这种固守，才会滋生、养育出今天开放性的儿童文学新作来。事实上，在中国现代及当代不少成功的儿童文学名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固守的痕迹，如《神笔马良》《宝葫芦的秘密》等，都是在这一传统上的创新与

再造。我们很难设想，重复人家的诸如白雪公主、小红帽之类已有的类型，能创造出什么新的形象或达到怎样新的境界。一个民族失去了自身的独创性而只是简单地去重复别人的东西，那也就消亡了自己。

没有文化传统的固守，也就没有汲取百家之长的开放，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充满了自信，才会敢于及善于接受外来的一切，拥有一个开阔的胸怀。害怕所谓保守的指责，不敢固守自身的文化传统，则只能成为当今所谓“世界性”的依附，一个最终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了的依附。

世界正是因它的丰富多彩才成其为世界，千人一面，那就不叫世界了，这么浅显的道理却没人好好想过。愈是民族化就愈有国际性，这曾经为不少人质疑、斥责与批判过，却是没办法推翻得了的。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在经历了无数风雨的洗礼之后，只会日益在开放的世界中显现出璀璨夺目的光辉——没有固守，这一光辉也就不复存在了！

三、唯美与文化

也许是受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的熏陶，我从小无论做什么事，总要做到最好，这就把自己陷于极为艰难的境地，这也许是儿童心理使然，及至创作儿童文学，也总是去追求一种纯美、完美的境界。我早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哪怕故事本身的背景再怎么凄惨、怎么残酷，也总要写出其中的美来，不让人失望，以至于被人称为唯美主义者或完美主义者。其实，这种唯美或完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视作儿童文学的一种属性，影响了好几个世纪。从儿童心理出发，凡事要最好、最美，也不难理解。但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是否就应在此故步自封了？

随着 20 世纪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完美的理性不足以解释这个世纪的种种黑暗与暴力。首先在美术上，由唯美主义向文化靠拢及转化，而西方当代美学，更早早出现了向文化研究转移

的趋向。这一切，几乎也同步在中国发生。如“五四”的旗手之一——许德珩先生所称：“过去的文化是历史，今天的历史是文化。”唯美主义、理性主义在20世纪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文化研究及非理性主义，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本身并不是纯理性的，更非唯美，每每充满了血腥与暴力。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已经告诉了我们很多很多。美学，在随着美术等门类向文化转移，自是题中之意，象牙之塔也无法在动荡的世纪中泰然自若。

所谓文化，无非是“现在进行时态”的历史。如许德珩先生所言，向文化转移，说到底，也是对现实、对人的关注。当然，现实与人，每每是历史的投影、传统的投影。因此，美术作品中的文化品位以及中国文学的“寻根”意识，决不等于对蛮荒岁月的展示，更不等于猎奇或裸露，也同样在于一种固守，对传统的固守，以确保开放的襟怀。

我想，儿童文学也是这样，我们这样一个创作群体，也在逐渐向文化靠拢。这不是追求什么时尚，而是更关注现实，关注生活在现实中的孩子，关注孩子的“历史”——赋予儿童文学以历史感。谁说儿童文学不存在历史感呢？我曾专门写了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儿童文学的文化品位，本身就带着历史感。儿童文学似乎是无历史的，但作为整体的儿童文学又如何？19世纪初的儿童文学与20世纪初的儿童文学一相比较，我们首先看到的又是什么？

当然，我们并不排斥写得很精美的儿童文学作品。坚持儿童文学的唯美倾向，同样是可敬且可行的，其实，唯美倾向，在《庄子》中也有，同样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只是，现实生活中的儿童，他们会受种种传媒的包围与轰炸，可能被校园“黑社会”所恐吓或欺诈，在商业社会早早介入及物质主义横行的情况下，儿童文学还能熟视无睹，仍置身事外么？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当然，喋喋不休的说教早已被证明是戕害儿童文学的元凶，

我们唯有拿出更生动、更形象、更鲜活的作品，才可能真正抗拒那些反人性、反文化的粗鄙的、纵欲的所谓时尚或流行的东西。

其实，真正有文化底蕴的艺术品，包括儿童文学作品，也同样包含有永恒的美的魅力，也不见得比唯美或完美的作品差一个档次。中国古代名著，包括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的童话，不少篇章都是很美的，很注重意境的营造与辞藻的锻造，如《鸽异》。可它又是很现实的，很有针砭的力度，具有文化品位。其实，唯美与文化，从来都不可以截然划分。当然，唯美主义指向的主要是自然，发现天然之美，但无论老庄还是孔孟，到最后仍走向“天人合一”——虽说现在对他们的理论有不同的理解，但同样作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发人深思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名言犹在耳边，在今天，我们谈可持续发展，谈生态平衡，不也正得益于古代哲人们的警诫么？这更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自然与人的焊接点，从中可以感悟出许多哲理。不要简单地把唯美与文化对立起来，二者交互的部分还有很多很多。尤其是儿童文学中，二者也许更为重叠、交互与融合，认识到这一点，儿童文学的审美空间才会更为开放，其历史文化的分量也更为厚重，真正的大作品才会脱颖而出！而不至于拾人牙慧而失却自我，也不至于唯我独尊而作茧自缚！

我以为，中国儿童文学在悟及这一切时，当会大有作为！

四、“内”与“外”

讲到中国儿童文学的审美空间，我用了“走向开放”这样一个限定词，这就意味着，这个空间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尚有未曾涉及的方面。这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而言，意味着更多的契机。但这种“开放”，我以为，不仅仅是对外而言，也应包括对自身的开掘。

举个例子吧，我最近编纂的《蒲松龄童话》便属于这种开掘，

从童话的角度上重新开掘。一旦我们打开了视野，摆脱了束缚，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对象——包括过去否定了的——进入儿童文学的世界。又譬如说，庄子那么多精美、深刻的寓言式或讽喻性故事，有没有可能以童话的形式加以再现呢？某些启蒙类作品，如果我们能去其糟粕，予以改造，也同样是可纳入儿童文学范畴的。甚至包括某些一度被否定的作品也可以如此……奇怪的是，在今天，仍有人采取封闭的心态，鹦鹉学舌，称中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为“俄化”。其实，中国在 50 年代，即便是外交上“一边倒”与苏联交好，也还不到 6 年，到苏共二十大便分手了，文化上又怎来得及“俄化”？五六十年代儿童文学名篇，如《小溪流的歌》《宝葫芦的秘密》《小橘灯》《一只想飞的猫》等，又何来什么“俄化”的色彩？相反，它们恰恰带着最典型的中国民族文化色彩。这里，我想起一位美国学者、哲学教授布拉克（H. Cene Blooker）在《当代中国美学》导论中，就 100 多年来中国学者吸收了西方理论写出的学术著作能否算作“中国的”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他是这么说的：

不管怎样，这是中国热衷于美学的知识分子们在 100 多年来所做的努力——吸收西方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把它们与传统的、古典的中国美学进行比较研究。如果我们不把这类著作当做是中国的，那么我们会得出一种荒谬的结论：所有的中国思想（文学、哲学、历史、宗教）在 100 年前就结束了。

他说的是 100 年，而“俄化”论者则只有 6 年——可见其荒谬。其实，就算是“文化大革命”，也与“俄化”无关。在儿童文学界，恐怕人人皆知我是为“左”所深害者，我没必要为受苏联影响的“左”辩护，但中国的“左”，恐怕更深植根于封建专制主义，而非别的。

而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自有其独立生长的逻辑，并不一

定完全服从于政治。回溯人类如此漫长的历史，一些皇皇巨制，恰巧就是在专制禁锢中写出来的。可我们能称之为什么“化”么？鹦鹉学舌者，对历史同样一无所知。

无疑，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中国儿童文学正获得前所未有的生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自身就可以“疯长”起来，它毕竟仍植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土壤中，长成中国的而不是别的什么，无论它汲取了多少外来养分，也不可能改变根系所在。不看到这一点，沉没于喧嚣的商潮人欲之中，失去东方特有的诗意情怀，那就不是什么“俄化”，而是物化了。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好以虚无自居，连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都不屑一顾，那他也就不可能拥有今天与未来，其作品也如时尚一般转眼即逝。

任何一厢情愿、强行地把中国思想体系嵌入西方概念模式中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正如把中国美学的意境、情境等硬套进西方哲学的某个术语，把这一体系说成是西方现成的模式，只能贻笑大方。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源流，同样与欧美的传统、源流大相径庭，某些术语都是无法共用的，审美取向上也各有千秋。整齐划一，从来就不是世界的本色。因此，取一种宏观的、也是开放的势态，去审视中国儿童文学的过去与现在，去追求未来美好的前景，创立自己的而不是附庸于他人的理论架构，今天当是时候了！

中国当代的艺术大师林风眠，20世纪初来到巴黎学习绘画，可是，法国国立美术学院院长杨西施在把他介绍到著名油画家罗孟的画室学习之后，却叫他在西方炫目的色彩中“蓦然回首”，告诉他：“你是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的、优秀的传统呀！”在成为世界著名的绘画艺术大师之际，林风眠于晚年的回忆中还这么反省道：“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中国的画家，当初，我还是在外国，在外国老师指点下，开始学习中国的艺术传统的。”

这一史实，引发了我很多的思考。

——今天，我又站在了当年林风眠“开始学习我们祖国自己的艺

术传统”的地方、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巴黎，做这么一番讲演，回顾中国的儿童文学，这一幕当是怎样的启示？

是的，中国的艺术家，包括儿童文学家，历来都很尊重、倾慕法国的艺术，包括法国的儿童文学，否则，我今天也不会来到这个以著名童话大师沙尔·贝洛名字命名的儿童文学国际学院来主持这个“中国儿童文学日”了。说来也巧，蒲松龄几乎是贝洛的同时代人，两人称得上是东西方童话的“双子星座”。今天，我也在贵市图书馆看到《聊斋志异》的法文版。现在，我们都一样站在古老而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上，让两国的儿童文学之交流在此激溅出绚丽的火花！

希望同样的学术活动，不久能在中国举行！

谭文亨

2004年2月28日